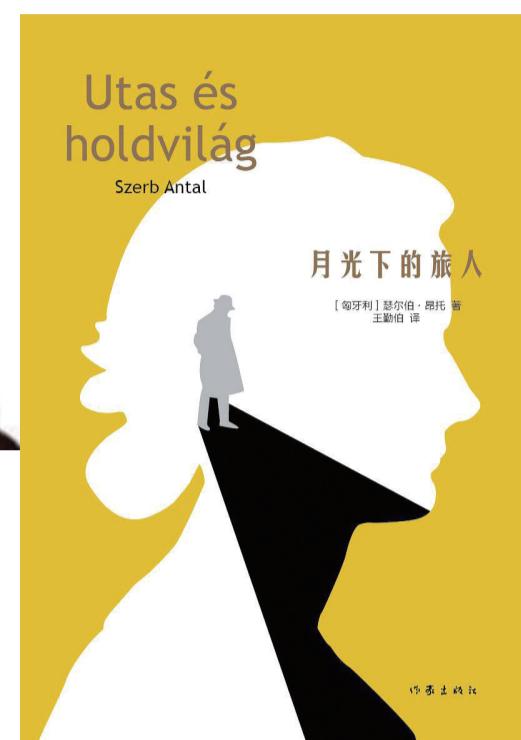




瑟尔伯·昂托《月光下的旅人》:

我们生命的路径都在写自己内心

□符 晓



任何时代都不缺少伟大的作家。然而吊诡的是,有很多伟大作家只存在于文学史的教科书中,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显然高于文学本身,倒是有些“不那么”伟大的作家,常常能够走进千万个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内心世界。瑟尔伯·昂托就是这样一位作家,至少匈牙利读者一直没有忘记他。

瑟尔伯·昂托1901年出生在一个匈牙利犹太家庭里,但是接受了天主教洗礼,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侨居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后来回到匈牙利,开始文学研究、翻译和创作生涯。因为过人的博学研究,他年仅32岁就成为匈牙利文学学院院长,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威廉·布莱克和亨德里克·易卜生,后来撰写了《匈牙利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即便在今天的匈牙利也享有盛誉,此外还创作了《英王传奇》《月光下的旅人》和《女王的项链》等几部小说。因为犹太血统,他1944年被纳粹送到匈奥边境为德军服劳役,1945年死在德国人的枪口下。从文学史的维度看,与其说瑟尔伯·昂托是一位作家,毋宁说他是

一位文学史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小说风度,《月光下的旅人》确实是一部值得回味的作品。

《月光下的旅人》是一部关于行走和回忆的小说,作者用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叙事逻辑完成了对主人公米哈伊在意大利所见所闻的叙述。米哈伊本来和新婚妻子蜜月旅行,但头脑中却一直萦绕着十几年前童年挚友托马西的自杀和艾娃的消失,和妻子走散后,他更是离奇地邂逅包括艾娃在内的少年玩伴,上演着关于死亡、爱情、往昔、历史和文明的一幕幕。作品首先是一部爱情小说。米哈伊和三位女性的爱情关系不尽相同:他对艾娃的爱完全建立在崇拜基础上,艾娃是他心中圣女一般的存在,爱而不得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孤独感并将其深藏在内心深处;他和

爱尔琦的“现代婚姻”事实上有名无实,婚姻形式后面潜藏着的是无爱的内容,貌似“偶合家庭”或者契约婚姻,所以无论他们谁离开谁,双方都不会感到惊奇;相比之下,他和米莉珍的爱情虽然短暂,但更显真实,米哈伊在米莉珍身上需要的并不是绵长的爱情,而是在人生低谷时对性或爱的阶段性慰藉。可以说,这三重关系代表了爱情存在的三种方式和可能,在爱情故事背后,昂托讨论的是爱情伦理问题,无爱的婚姻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对往昔恋人的爱是否可以持续到生命的尽头?爱情是否可以拯救一个处于生命低谷中的人?直到小说结束,昂托也没给出这些问题的真切答案,而是做了开放

式的处理,尝试与读者完成一次“视域融合”。瑟尔伯·昂托在小说中还想要表达自己的生命哲学。死亡,一直都与主人公米哈伊相伴相随,“病理性死亡想象”成为他的重要标签,在他的怀旧中无不充斥着对死亡的恐惧、迷惑、向往等多重矛盾倾向。在托马西和艾娃的爱情中,在儿时的童年戏剧表演中,在意大利比奥的死门中,米哈伊都看到了死亡,可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死亡意识”基因的携带者,一直在考虑用死亡摆脱“此在”。那么,为什么昂托要在小说中出离爱情而着重描述死亡呢?

从浅层说,作者言说的是作为人类独立个体面对死亡的态度。从少年时代起,米哈伊就深受死亡哲学和生命政治的影响,他和他的身边人(包括托马西、埃尔文等)对死亡有一种本能的“莫名”“好感”甚至“快感”,所以对他来说,“向死而生”和赴死都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面对死亡,米哈伊又表现出了深刻的矛盾性,按照弗洛伊德的逻辑,他的自我很难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平衡,导致他成为一个怯懦、敏感、孤独和游移的人,体现出来的是歌德所谓哈姆雷特的那种“软弱”。一方面,死亡成为米哈伊逃避现实的归宿,他不谙社会规则,出离于世俗社会之外,好友的离世、爱人的消失、婚姻的虚无,加上他在旅途中经历的意大利民间生死观念,使他一步一步增强了赴死的决心,成为和托马西一样的“英雄”,他的回忆和多次幻觉事实上无一不是在说服自己存在的“无聊”和死亡的解脱。另一方面,虽然米哈伊鼓足了死亡的勇气,但是面对故乡和来自故乡的父亲,勇气又显得格外单薄,解脱无非是自己的辞说,当活生生的现实真的摆自己面前时,他却感受不到死亡带来的任何甜蜜,反而心生“倦怠和疲惫”。他发现,“从众”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只要人活着,总还有可能发生点什么”。可见,昂托通过米哈伊关于死亡的思想与行动表达的是人类矛盾性。

从深层上说,死亡在《月光下的旅人》中成为某种人类历史的象征。在米哈伊和瓦尔德海姆关于死亡的对话中,后者坦言,“文明越强大,死之爱就越好好地埋藏在意识下方”,“在文明社会里,死亡完完全全是一个禁忌概念”,米哈伊深以为然。这说明,随着文明时代的来临,人们思考死亡的时代行将终结,因为现代产生的很多事物深深吸引着人们,使他们无暇思考死亡,或者说,他们不愿意思考死亡,使得死亡成为禁忌。而米哈伊之所以“迷惑”死亡,完全是出于对传统的“忠贞”。死亡

观念是托马西承袭或延续给米哈伊的,正因为他们的思想的共鸣,导致米哈伊一直想要赴死,其共鸣在于,他们无法接受现代社会的诸多现实,以致将死亡看作是传统的隐喻。换句话说,托马西和米哈伊都是“厚古薄今”主义者,托马西认为“古老即是正常,现代则是怪诞诡异”,可以说也是昂托关于历史观的宣言,只不过这种观念通过死亡表达出来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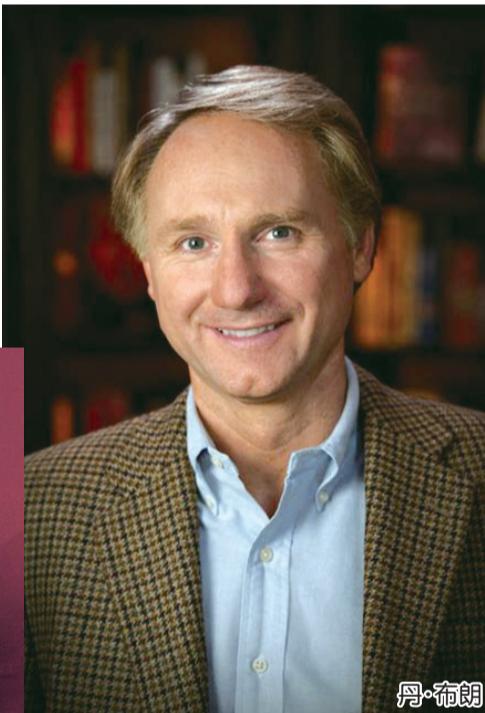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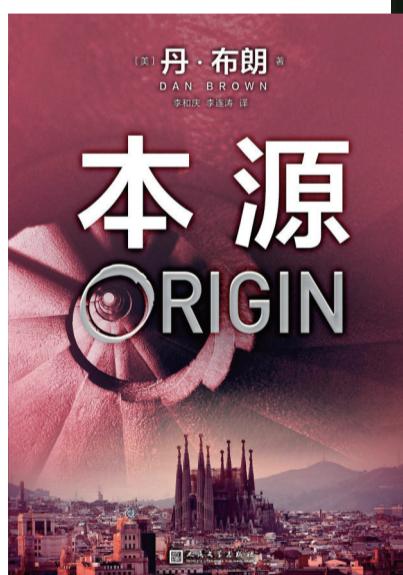
在《月光下的旅人》中,一直存在意大利与匈牙利的对照,与其说这种对照是空间上的,毋宁说这种对照是时间上的。为什么米哈伊的旅行一直在意大利?就是因为他灵魂的寄托托马西“一直憧憬着意大利,那里一切皆古旧,正合他的口味”,同时,米哈伊也发现了“佛罗伦萨城里一条街比匈牙利的七个州府蕴涵着更多历史”,可见,米哈伊迟迟不愿意回到故乡,在于他倾慕托马西眼中共同的意大利古老传统。可以说,匈牙利是现代的象征,意大利是传统的象征,死亡则是传统的象征,米哈伊之所以在小说最后回到故乡,恰恰是因为他对现代的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月光下的旅人》讨论的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中,人作为个体所面临的历史选择问题。这是作者对现代匈牙利的思考。这是匈牙利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

其实,无论是死亡与爱情,无论是过去与现在,无论是故乡与异乡,主人公寻求的都是与自己的和解。米哈伊事实上一直生活在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所有叛逆、反抗、探索和疏离所引发的关于人生和生活的矛盾归结于平静,“从众”成为通往澄清的必然路径。这也许是《月光下的旅人》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借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我们生命的路径都写在自己的内心,宿命的星辰也在那里恒久闪烁”,实际上,在米哈伊远去的背影中,我们看见的是逝去的斑驳岁月,还有我们自己。

■作家原声

指南针存在于我们的心灵

□【美】丹·布朗



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教我写作,还帮我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我口述,我妈妈做记录,首印只有一本。我们把这本书写在木纸板上,钉了两个小洞,我现在还有这本书。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书名叫《长颈鹿、猪和着火的裤子》。我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从不羞于告诉别人她的信仰。我小时候喜欢踢足球,妈妈开车送我去踢足球,她的车牌上面写的就是一个字,这个字是古希腊语,意为“上帝”。她想以一种非常含蓄的方式告诉大家,她信仰上帝,她是基督徒。在受到母亲基督教方面影响的同时,我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非常有趣的是,我的父亲是一位数学老师,一位数学家,他写了一本有名的数学教科书。他也有自己的信仰,那就是数学、科学。父亲当然也有一些宗教方面的经历,但是那些经历其实都和数学方程式有关。由此你可以看出我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矛盾体,就知道为什么那时我是一个问题少年,现在也是一个问题作家。

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有宗教热情的母亲、为数学痴狂的父亲,你可以想象,童年时的我是多么精神分裂啊。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的母亲会做很长的餐前祷告,但在母亲做祷告的同时,父亲就会用小胡萝卜给大家切出不同的几何图形。哦,对了,忘记告诉大家,我父亲的车牌上面写的是一个数学单位。我的父母就是这个样子的。

虽然我的父母有不同的信仰,但是我们家庭非常和谐,父母亲都非常尊重对方。我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一开始也没觉得什么,直到我慢慢长大了以后,我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是完全对立的。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对立,也不是所有的对立的人都可以成为夫妻。基督教《圣经》的教义里说,上帝用七天时间创造了世界,但是我在课堂上学到了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圣经》里说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和所有的动物,但是就在前一天我可能去了波士顿的科学博物馆,看到了化石,了解到了进化论。所以有一天,我碰到一位神父,问他应该怎么对待这种不一致,我其实是想问他哪一个故事是真的。这位神父跟我说,好孩子是不问这样的问题的。

我像神父说的那样,像所有的好孩子一样,开始不问这样的问题了,但是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对这样的问题着迷起来,这样的问题渐渐演变成了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成了我生活的主题、写作的主题。

在写作《本源》时,我做了很多研究,我和科学家在一起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人工智能。很多科学家对我说,他们都相信有一天人类将发明出人工智能机器,而这个机器是有自我意识的。我就开始想,如果把这个有意识的人工智能机器放在黑色箱子中,不

告诉它谁创造了它,也不告诉它为什么要创造它,就让这个机器在黑暗中默默地生活,就像人类在黑暗中生活一样,那么这个机器会不会问自己一些问题呢?它会不会问自己是怎么来的,谁创造了它,简单说就是,这个机器会不会有好奇心,它会不会想自己的本源,它会想知道什么?它会不会像人类一样去编织故事、历史、神话,说服自己这就是本源,而不是承认它不知道。

不管我们有没有宗教信仰,我相信大家一定有类似的经验,那就是如果我们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也会自问到底是什么创造了我们人类,创造了生命。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可能我们一辈子都找不到答案。但这时,我们的信仰其实已经无所谓了。当我们仰望星空,享受这个美妙的时刻,当我们抱着新生的婴儿时,当我们坠入爱河时,或者当我们想到人会变老会死的时候……这些都是些普遍的经验。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既然大家的情感和经历如此相似,为什么世界上存在那么多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教义?其实我的答案是,这些宗教都非常相似。当我们想量化我们的经验,记录我们的经验,分享我们的经验时,当我们想用一种建筑学理论来解释一些神秘的古老建筑,当我们想用事实解释一些隐喻,当我们想用不同语言或者叙述方式表达情感的时候,不同的宗教才会出现。

其实,我们内心都有一个道德的指南针,不管这个指南针是由信仰驱使的,还是哲学、家庭、朋友,还是所有的这些结合,这个指南针都存在我们的心灵里,而且它们带着一些绝对的价值观。不管我们住在哪里,说什么语言,信仰什么宗教,这些价值观其实都是不变的。这些价值观总结起来,就是人要善良,不要残忍;人要创造,不要破坏;人要去爱,而不要去恨。

我想说,人类从生火到生产汽车,中间经历了100万年的时间,然后花了几千年时间发明了印刷术,又花了几百年的时间发明了望远镜,然后在接

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用非常短的时间制造了蒸汽火车、汽车、太空船,又在过去的20年间实现了基因转化技术。现在的科技发展其实是以月来计算。

从今天开始到不远的将来,超级计算机可能就会变得像算盘一样大小,今天的手术技术在将来可能会被看成很原始的医学技术,而现在的能源技术在将来的人眼里就像我们看古人在用蜡烛照亮。25年前的我们怎能想到25年后能用到如此高端的科技,人类的发展速度、人类科技的发展速度已经以几何方式计算,古代和现代之间的距离已经渺小到了微乎其微。

未来的科技能做的事情是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未来我们的探索力和创造力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就出现了问题,科技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哲学思考能力、道德观、价值观、伦理观能否跟上科技飞速发展的节奏,以至于我们可以负责任地使用新科技。

面对未来的道德困境,不同的宗教信仰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会影响我们的选择吗?事实上,自古以来所有的信仰都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选择。不同的上帝、不同的宗教会在未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知道每个人的决定都是不一样的。希望大家记住,我们出生的时候,基因中并不带着信仰,我们只是出生在不同的文化中,出生在不同的家庭里。世界越来越小,如果我们相信任何信仰都是绝对的、极端的,认为和我们想法不同的人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人类希望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怕提问,更重要的是不怕对话,特别是与和我们观念不同的人对话。

(本文据丹·布朗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整理,翻译:李康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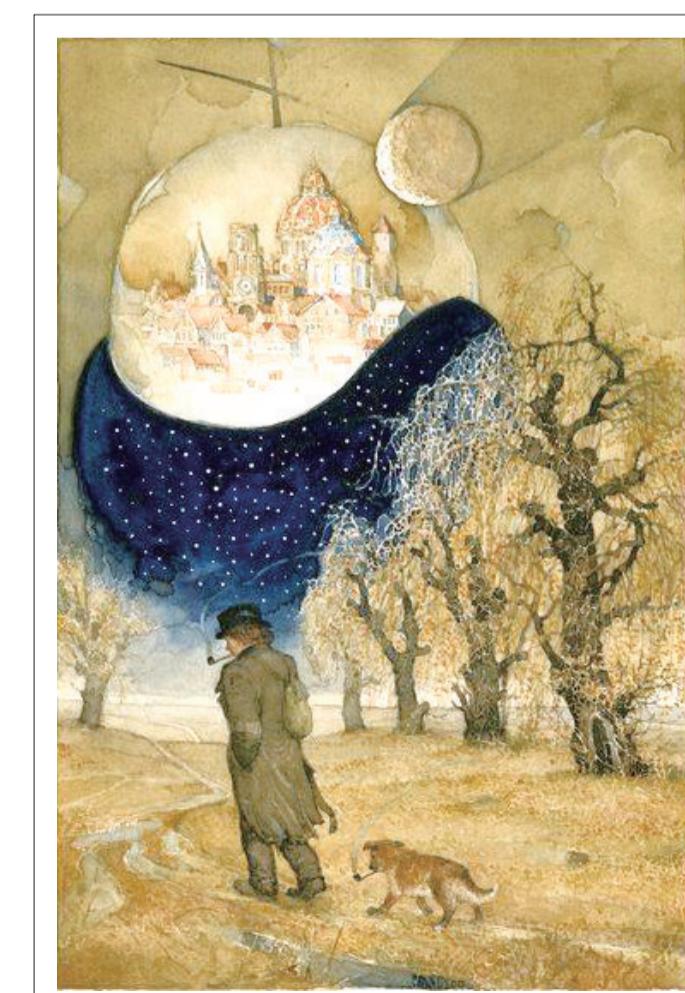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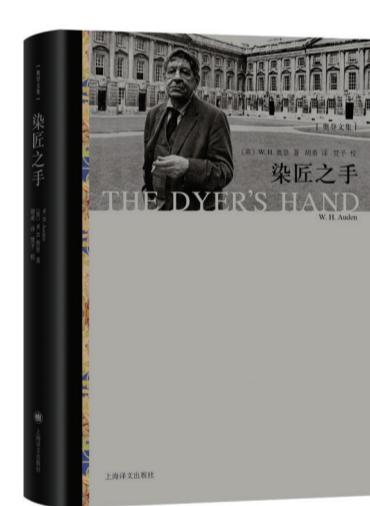
■书讯

W.H.奥登散文集《染匠之手》中文简体版出版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W.H.奥登的散文集《染匠之手》中文简体版。

《染匠之手》收录了奥登精彩纷呈的散文作品,包括他作为牛津大学诗歌教授发表的讲演录。书中的文章题材广泛却又互有关联,对诗歌、对艺术、对人生的种种境况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所思、所感独出机杼,不落窠臼,核心的关注点虽然是文艺,立论的背后却是作者在20世纪中的全部经验,是奥登的文学批评代表作。

W.H.奥登(1907—1973)是英国名诗人、评论家(由于出生于英国,后来成为美国公民,所以也有人将其列为美国作家),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奥登的作品数量巨大,主题多样,技巧高超,身后亦备受推崇,其独特风格对后辈作家影响深远。此次出版的《染匠之手》是该书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五卷本“奥登文集”的收官之作。



世界文坛

SHIJIE WENTAN

乌克兰画家康斯坦京·卡里诺维奇为法国诗人兰波《诗集》所作插图。